

地理学与地方志^①

地理学与地方志有密切关系，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我国历史上大量修纂地方志始于六朝，从这个时代起，地方志就被认为是一种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二在著录了如《洛阳记》、《三巴记》、《淮南记》等六朝地志 139 部后，卷末说明云：“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录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以备地理之记焉。”

到了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地方志已经为数甚多。《四库全书》把地方志编入史部地理类，正式录入《四库》的，有从乾道《临安县志》起的宋、元、明著名地方志 25 种及清畿辅和各省通志 14 种（地理类一），而《四库》存目的，则有明、清地方志 107 种（计地理类存目二 37 种；存目三 70 种），由此可知，从六朝到清代，地方志都被认为是地理书，所以这种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

六朝地方志内容简单，一般都不分卷。但到了宋朝，地方志内容增加，志书从此分卷，各卷设有卷目，而地理开始成为卷目的名称。在现存宋代地方志中，最早以地理作卷目的，大概是嘉定《镇江

志》^①。此志卷一、卷二，卷目均作地理，卷六亦作地理，前后共有三卷。此后嘉定《赤城志》设地理门三卷（卷一至卷三）咸淳《毗陵志》亦设地理三卷（卷一至卷三）到了明、清地方志中以地理为卷目的十分普遍，它们有的称为地理志，有的称为舆地志，其排列与宋代一样，往往置于全志之首。

如上所述，六朝地方志在后代的公私著录中都作为地理书，而宋代以后，地方志中又专设地理卷目，地理学与地理志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而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新修地方志，也继承了我国旧地方志的这种传统，它们普遍以地理作为篇目或卷目，并且收入了大量的有关地理学的资料，丰富了新志的内容。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从宋代以至明、清，地方志中的地理志或舆地志，其内容与现代地理学有很大差别。旧志中的地理，或者把它称为古典地理学，这种地理学的概念，用《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首李鸿章序言中的一句话就可说明：“夫舆地之学，乃读史第一要义”。这就说明当时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目的是为了帮助读史。因此，它的内容是很狭窄的。如上述嘉定《镇江志》，卷一地理只有叙郡、子目两项，卷二地理也只有城池、坊巷、桥梁、津渡四项，卷六地理则仅山川一项。嘉定《赤城志》卷一地理门下有叙州、叙郡二项，卷二地理门下有城郭、乡里、坊巷三项，卷三地理门下有馆驿、桥梁、津渡三项，此外，它另设山水门从卷十九到二十六达八卷之多。咸淳《毗陵志》地理三卷内容与《赤城志》相似，卷十五也另设山水一卷。说明宋代地方志的地理卷，内容无非是州郡沿革、城邑坊巷、桥梁津渡之类，甚至连山水也不在地理之内如嘉定《剡录》、淳祐《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咸

^①嘉定《镇江志》与嘉定《赤城志》均设地理卷，前者修于嘉定七年（1214年），后者不记修纂年月，但卷末有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陈耆卿序，癸未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故嘉定《镇江志》修纂在前。

淳《临安志》等，均只设山川志，不设地理志，足见宋代方志中的地理卷，范围非常狭窄。明、清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内容较宋代有所扩充，山川湖陂之属，多已归入此志之中，但与现代地理学所涉及的领域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和古典地理学不同，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它是一门以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发展、变迁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所以称为综合性的科学，是因为它有属于自然科学体系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人文地理学两大门类。不论是自然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又都可以分为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两部分，自然地理学按系统包括气候学、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海洋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按区域则是区域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按系统包括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按区域则是区域人文地理学。此外，还有一门特殊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差别，主要是研究对象在时间上的不同，地理学研究现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历史地理学则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上面简单地介绍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主要是为了说明它与古典地理学的差异，目的则是为了在目前的地方志编纂中，怎样处理好地理学与地方志之间的关系。关于这方面，我在拙编《浙江地理简志》^①的序言中，已经有所阐述。在谈到旧地方志时，我说：“在现代地理科学未获得发展的古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地理事物，只不过是许多地理现象的罗列，还谈不上对地理事物及现象进行分析。”在民国以后修纂的地方志中，我的这篇序言举了一个在这方面成绩卓著的例子：“民国以后陆续修纂的地方志中，人们开始把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编入地理志和其他有关的卷帙。民国 22 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1933 年) 创修到 26 年(1937 年) 基本完成的《鄞县通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方志中有关地理学的内容,除了集中在舆地志中外,还分散在博物、工程各志内,资料相当丰富。它不仅记载地理,并且涉及地质,不仅对地理事物和现象作性状的描述,而且对某些部分(如气象等)作了大量的记录。此外,它摒弃了自裴秀制图六体以来流行了 1500 年之久的方格地图,而改用有经纬网络的新式实测地图,使浙江省的地方志修纂首次跳出旧舆地学的窠臼,而步入新的地理科学的体系。”

民国的《鄞县通志》的修纂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地理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区都已积累了比 50 年前更为丰富的地理学研究成果。现在,怎样处理地理学与地方志的关系,如何利用各地地理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已经成为新修地方志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如上所述,旧方志中有以地理设卷的传统,新方志中如何继承这种传统,看来值得研究。古典地理学领域狭窄,旧志在地理志或舆地志卷中,完全可以纳入当时属于地理学的一切资料。但是现代地理学领域广阔,内容繁多,新修方志如以之作为篇卷标题,其结果很可能要流于文不对题。假使勉强地把许多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塞入这个篇卷之中,则又势必影响方志的其他篇卷,有损于新志的严谨体例。现在,有的新志以“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但内容其实仅涉及自然地理学的若干方面,置人文地理学于不顾,故“地理”这个标题显然不妥。有的以“自然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但内容除自然地理学的若干分支如气候、地貌以外,多数均加入“地质”一篇。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组成物质的科学,它与地理学是研究对象不同的两门科学,怎能并存于“自然地理”一个标题之下?但以一个市、县的范围,地质单独列为一个篇卷,看来又无此必要。

根据上述,说明在新修地方志中,似乎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因袭旧志传统,以“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不设标题,并不削弱地理学与

地方志的密切关系。因为有关地理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可以分别吸收到新志的许多篇卷之中。半个世纪以前的《鄞县通志》，虽然尚有舆地志之目，但是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其实已经分散在其他许多篇卷之中。现在我们更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

怎样把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资料收入新修地方志呢。首先，在自然地理学方面，由于自然环境是地方志开宗明义必须记载的内容，因此，自然地理的资料，可以相当集中地在“自然环境”的篇卷标题下收入志书。以“自然环境”作标题，也就替地质部分收入这个篇卷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一个地区的地质、地层、岩矿等内容，同样也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地质是一个地区自然环境的基础，因此，地质可以置于这个篇卷之首。然后再按自然地理学的体系依次叙述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生物等沿海市、县，当然还应把海洋列入。至于有的新志，在气候中增入物候与灾害天气，另外又增加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等内容，这些当然都可按所在市、县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必强求一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在我过目的新修地方志中，其中有一部分，在动植物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二名法的表示方法。对此，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在动植物名称下加注拉丁文学名，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鄞县通志》已经采用的先进方法。为什么要用二名法？因为动植物的种类甚多，而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又很复杂，因此，在动植物名称中，同物异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命名如不统一，人们就无法知道你所说的这种动植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例如世界广泛栽培的马铃薯，在英文中作 potato 在法文中作 pomme de terre，在德文中作 kartoffel，在俄文中作 картофель；此物在中国，因为地区不同，也有许多不同名称，如土豆、地豆、山药蛋、洋番茄、洋芋茛等等，假使不使用拉丁文二名法 *Solanum tuberosum* L. 注明，许多人就会无所适从。在我国各地的旧地方志中，动植物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存在着大量同物异名的现

象。以栽培极普遍的玉米为例，此物的记载，首见于明正德《颍州志》，称为珍珠秫。以后，明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称此物为御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为玉蜀黍。入清以后，由于播种地区扩大，别名愈益增加，如苞萝、苞谷、六谷、乳粟、芋米等等，不一而足。在我所过目的一种新修地方志中，也出现过玉米、山玉米、田玉米这三个名称，这就是因为不用二名法注明 *Zea mays* L.，所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完整的二名法，包括首字大写的属名（*Solanum* 茄属）、首字小写的种名 *tuberosum*（具块茎的）和此学名定名人的缩写字母（大写），马铃薯和玉米均作 L.，指的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 Linnaeus）。但是现在我们在使用中，常常只用由属名和种名组成的学名，省去定名人的缩写。我国土地广大，生物繁多，而方言又很复杂，各种动植物多有当地的旁名别称，若不以学名加以标准化，实在不堪设想。近年来的新修地方志中，由于有一部分不用二名法，已经出现了不少错误，上述三种玉米即是其例。还有一种新修地方志在植物“铁杉”下说：“俗称马尾松”。这也就是不用学名所造成的错误。铁杉（*Tsuge chinensis*）和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完全是两种树类，怎能混为一谈。当然，也有可能在该地确把铁杉混称马尾松，但真正的马尾松在该地又称什么呢？这些问题，都要用学名才能澄清。不错，作为一种地方志，记载当地的动植物时写明当地的称谓，这是必要的，但绝不应只载土名而不载学名。我又在另一种新修地方志中看到：“黄山松又叫短毛松”。其实，短毛松当然是土名，而黄山松也不是正规的名称，这种植物的学名应作台湾松（*Pinus taiwanensis*）。鉴于动植物名称的错误，在新修地方志中发现较多，所以必须引起注意。

现在再讨论一下人文地理学资料如何收入新修地方志的问题。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和内容远较自然地理学广泛，在地方志中，它涉及沿革、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城镇、人口、民俗、宗教、方言等许多方面，所以在一部地方志中，大部分篇卷都和人文地理学有

关。在修纂地方志的资料积累过程中，有关人文地理学的资料必然数量巨大，对于这类资料，必须进行仔细的分类，收入各有关的篇卷之中。另外，在地方志各篇卷初稿的审阅中，也有必要运用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加以补充和修润。人文地理学不仅重视各种人文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且特别重视各种人文现象的地区差异和地理分布。例如，文化教育是一种人文现象，在新修地方志的文化教育篇卷之中，当然要记载这个市、县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必然要统计各级学校和文化机构的数字，各级学校历年来的毕业生数字等等。但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必须分析各级学校和文化机构在这个市、县内各乡的分布，各级学校历来毕业生在各乡的分布。这样就可以看到市、县内部的文化差异，从而有利于对文化后进地区的扶植。这就是文化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地方志中的人文地理学资料，必然可以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我在最后一段时期读了十几部新修地方志，还有一些地方志的打字稿，看到了新修地方志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一些尚可讨论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首先是地方志的建置沿革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就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为沿革地理。这实在是市、县地方志开宗明义的部分，关系极为重要。在我过目的新志和打印稿中，这一部分的写作水平差距很大，其中有不少错误是随意抄录旧志而造成的。以浙江为例，我看到有“夏代属扬州”的说法。这显然抄自旧志，旧志则来自《禹贡》“淮海唯扬州”一语。其实《禹贡》早已论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禹贡》九州，完全是一种设想。这一部分的另一种常见错误，是引书不经核对，结果是以讹传讹。由于叙述历史沿革，往往要引用古代文献，我曾经发现几种志书和书稿，它们所引用的古籍如《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之类文字和原著很有出入，甚至比原著多出一、二句。说明撰写者是从旧志或其他地

方文献抄来，未曾找原著核对。较原著多出的一、二句，当是他书引用时的按语，撰写者亦作原著抄入，以致造成错误。在新志修纂中，不管是哪一篇卷，凡是引用其他文献，不论古今，都必须与原著核对。另外，建置沿革既然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所以内容还应该注意两点。第一，除了郡、县名称和隶属关系以外，地理学重视地理位置的变迁，为此，这一部分必须叙明在历史上市、县治所（即县城）的位置变迁。第二，在沿革叙述中必须涉及地名，地名往往和一地的兴废渊源或其他历史掌故有关，正确的地名解释，甚有裨于历史沿革的叙述。地名学已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近年来发展甚速，全国各市、县，多已完成了地名志或地名录的编纂，这些成果，新修地方志应该尽量利用。

近年新修地方志，经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篇卷，这当然是正确的。人文地理学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在所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中，经济地理学是最大的分支，这门科学研究生产力的地理配置。地方志对地区经济的记载，除了对整个市、县的纵向叙述外，还应具备市、县内各乡镇横向比较的资料，这种资料在阐明一定时期中市、县内部的经济差异方面很有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各市、县中心的经济比重有所下降，因此，这种资料对说明市、县内部生产力配置变迁的动向和经济差异，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修地方志在经济篇卷中大都重视统计学方法的运用，这是很好的。不少统计图表比文字更容易说明问题。假使能够把统计学方法和经济地理学的资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各种统计图表的设计中，能够适当增加若干乡镇对比的资料，例如全市、县各乡镇工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各乡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等图表，对于说明市、县内各地区的生产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情况，都有重要价值。

在新修地方志中，人口都作为一个篇卷，居于方志中的重要地位。不少新志在这一部分的内容结构中，不仅从人口学的角度记载资料，同时也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记载资料，并且还把有重要意义的计划生育等内容列入此篇，成为新方志的显著特色。人口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地方志中用人口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记述各市、县的人口概况，可以补单纯从人口学的观点和方法记载人口概况的不足。人口地理学非常重视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重视地区内外的人口流动，并且重视每个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构成情况，除了土著人口以外，是否有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是按什么路线移入的。这些事实的调查记载，不仅充实了人口篇卷的基本资料，而且与地方志的其他部分如宗教、民俗、方言等，也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所见到的新修地方志中，多数都已将方言列入篇卷，这也是新方志内容的一大进步。不过，不少新方志的方言部分，从整个市、县记载语言，包括语音、声调、语法甚至声母、韵母、俗语、俚语等等，但另外的一些新志，在市、县范围以内，又记载了若干个方言小区，并记载了这些方言小区的语音、声调、语法等特点。后者当然胜过前者，因为这样的记载，不仅具有语言学的内容，而且兼及方言地理学的内容。其实，在一个市、县以内，语言完全没有差异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有的甚至有极大差异。以浙江省为例，杭州市区在方言地理学中就是一个孤岛，它同周围的吴语系统的方言有极大差异，具有明显的中州语的语音和音调的特点。在杭嘉湖平原上的许多市、县境内，常常有绍兴语的方言孤岛，有时是一个村，有时是几个村。在湖州市属的偏西各县，还存在着湖南语的影响，包括方言影响和地名影响（例如这一带有不少称“冲”的村落）。在海宁市沿海的盐官镇一带，又有若干萧山语的村落。这些都是在一个不大的地区内方言差异的例子。对于市、县内部方言差异的调查和记载，涉及移民、民俗、宗教等许多方面。例如上述杭州市区的方言孤岛，

显然是两宋间中原居民大量南迁的影响。杭嘉湖平原中的绍兴方言孤岛，是明、清以来绍兴人不断移民的结果。湖州市属几个县的湖南语影响，则是太平天国时代在这一带驻扎的湘军退伍后大批留居所造成。盐官镇一带的萧山语村落，实系 20 年代钱塘江南岸沙地崩塌时成批渡江北迁的萧山居民所建成。由此可以说明，在新方志的方言篇卷中，如能以方言地理学的观点重视市、县境内各地的方言差异，则在语言本身以外，还能由此解决其他许多问题。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以外，地方志的其他许多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某些地方病有很大的区域性，故地理学中有疾病地理学）、宗教、商业等等，都和自然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有密切关系。陈正祥教授在其所著《中国方志的地理价值》^①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地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他并在这句话以下作了一条脚注：“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 故在内容上颇和中国的方志相似。”我从陈氏的这番议论中，引出了地理学方法在新志修纂中的重要意义。在各种地理学方法中，野外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地位，我指出：“随着方志内容的发展，方志修纂的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进，而上述区域研究方法的应用，在今后的方志修纂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资料整理工作仍然必需，但实地调查工作在新的方志修纂中将显得越益重要。这种野外调查的方法，和上述区域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今后，我们的方志修纂事业的继续发展，其生命力恐怕就在于此。”^②

总之，地理学和地方志的密切关系，已为地理学界和方志学界所公认，在今后的新修地方志中，如能重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各种观点、资料和方法，必将有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

香港中文大学 1974 年出版。

史念海、曹尔琴合著《方志刍议》卷首拙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地方志的学术性与实用性^①

——兼论索引的价值

修志十年，成就非凡，这是人所共见的。不过学术界有一些人对于地方志，至今还有一些看法。他们认为修纂地方志，并不算做学问，而所谓方志学，也不是一门学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尽管他们也利用方志做学问，而且做出了成果，但是他们的上述观点却很难改变。有些人做学问有了成就，你封他什么家，如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都能接受。唯独不愿别人称他为方志学家。写论文也是这样，许多明明来自方志的资料，总要千方百计避开方志的名称，而把方志作为一种寻求资料的线索，设法转换成其他出处，然后写入论文脚注。因为在一篇论文脚注中，假使罗列的方志太多，则论文的身价就会下跌。这些现象当然并不正常，却是由来已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简而言之，不少旧方志的质量低劣，实有以致之。所以，要让学术界对地方志持有成见的一部分人改变观点，我们在修纂新方志中就必须努力注意质量，这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十年以来修纂的新方志，确实已有许多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学术界提高方志身价的重要途径。提高地方志的质量，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要从提高地方志的学术性和实用性着手。有了这两者，方志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样的方志，从宏观上说，它达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可以传之后人，裨益后世；而更具体地说，学术界可以既放心又便利地利用它做各种

原载《浙江方志》1993年第4期。

学问，而不少人对方志的成见，或许也就可以消弭了。

什么是地方志的学术性？所谓学术性，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就是科学性。首先，地方志是一种各行各业都要利用的工具书，它内容繁多，门类复杂。所以，如同其他工具书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是我们的地方志，却又有别于诸如字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之类的工具书。它虽然是许多不同卷篇的组合，但这种组合既继承了历来的传统，而又不断有所创新。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具有较高质量的志书，它们从卷首的《大事记》到卷末的《附录》，其中包括地方志的许多共性卷篇和若干个性卷篇，统率全志的概论和总起某一卷篇的无题小序等等。它们在这种组合之中，表现得非常协调和谐。一部编纂得体的志书，虽然内容庞大，子目纷歧，却不会给人以杂乱和拼凑的感觉。这种组合，就是中国传统的志书组合，是具有学术性的。为此，修志同仁，特别是掌握全局的正、副主编，必须尽最大努力，充实和完善这种志书组合，从而提高地方志的学术性。

其次，地方志的学术性，特别体现在它的卷篇结构之中。假使把上述志书组合比作地方志的群体，那末，卷篇结构就是地方志的个体。前面已经提到，地方志是工具书，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从应用的观点说，个体比群体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更可以体现志书的学术性。譬如旧方志都有舆地志（或地理志）这个卷篇。旧志的舆地志，大概都是些山、河、湖、泉等自然地理实体的机械排列，没有内在联系，更谈不上什么理论。新方志的地理卷篇就大不相同，因为我们懂得用科学的自然地理学理论和实践来编纂这个卷篇。自然地理学的重要要素如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生物，都能各得其所，各有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当然，这个卷篇在新志编纂中也出现过问题。例如有的志书，把卷篇名称定为《自然地理》，但内容却包括地质，记载了当地的地层、构造、岩矿等等，这当然有损于学术性。因为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是两门不同性

质的科学。前者研究自然环境的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而后者则研究地壳的组成物质，当然不能混为一谈。考虑到地方志记载一市一县，地区范围不大，地质确实没有单独设立卷篇的必要，可以与自然地理合成一个卷篇。但卷篇名称应该是与这两门科学共同有关的《自然环境》。

第三，是对具体事物的记载和解释，必须力求正确，这是体现地方志学术性的重要方面。旧方志由于时代的限制，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甚多，有的甚至荒诞不经。当然，旧方志中也有在这方面非常出色的例子。如 30 年代修纂的民国《鄞县通志》它以现代科学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理论记载气象气候，用科学的地质学理论记载地质、地层和岩矿，并且首创海洋专目，用现代海洋科学理论记载近海海域。在半个世纪前的旧方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确难能可贵。新方志当然更应有所发展，有所进步。这里所举的《鄞县通志》的例子，涉及的都是重大事物的记载和解释。对一般事物的记载和解释，也都必须正确无误。例如这几年中我们在某些志稿中看到的用“法币”计算民国 20 年的物价而其实“法币”是 1935 年 11 月 4 日才颁布实施的；又如人物传中记及某教授曾任英士大学地理系主任，但英士大学却从来就没有设置过地理系。诸如此等虽属小事，却也都有损于志书的学术性，不能等闲视之。

第四，是地图和照片。我国地方志发展过程中，从北宋的图经起，开始重视插图，从此建立了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因此，总的说来，地图和照片，是上述志书组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的存在，与志书的学术性具有重要关系。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旧方志的示意地图和插图，至今已发展到了计量地图和照片。一幅计量地图，在地图上可以计算出各地的距离、面积和其他有关数值，所以必须由懂得地图的专家来编制设计。照片可以增加志书的直观性，但内容必须严格选择，应该密切配合志书的卷篇。那些仅有宣传意义甚至属于广告一类的照片，必须坚决排除，因为这是

非常有损于志书的学术价值的。

现在谈谈地方志的实用性。修纂一部地方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用。陈正祥在其《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①一文中述及他在日本用地方志做学问的情景：“为查阅方志，我曾遍访日本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像蜜蜂采蜜似地辛勤工作。”对于修志同仁来说，我们的劳动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利用，应该感到慰藉。而正因为此，我们更要提高我们作品的实用价值。

实用性是什么，它与学术性之间有无矛盾？记得往日我曾主编过一种《浙江古今地名词典》^②。为了让词典读者能够利用词典做学问，我坚持对每一个地名的出处必须写明资料来源和文献卷次。出版不久，得到学术界一位领导的赞赏，他说：注明资料的详细出处，其本身是一种学术性的表现。但读者能够借词典提供的线索，继续扩大加深，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这又是一种实用性。所以学术性和实用性，不仅没有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地方志的学术性与实用性的关系，大概也是如此。地方志是一种科学的资料书，它不可能做到“引人入胜”，但应该力求“引人入胜”。使用地方志的人，主要是搜索他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为此，地方志必须千方百计，用最小的篇幅，提供最大的信息量，使读者阅读时有左右逢源之感。这就是地方志的极大成功。

另外，地方志为读者提供资料，不仅要丰富，而且要适当。这个“适当”的意思，指的是地方志提供的资料，必须基本上在前述志书组合的范围之内。我们当然提倡地方志修纂必须突出地方个性，但也决不能因此偏废地方志的共性，也就是不在志书组合上有所欠缺。鉴于用地方志做学问的学者，往往通过大量地方志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必须在这方面引起注意。举个简单例子，譬如研究一个较

^①《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②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大区域内古今地下水位的变化，由于地方志有井、泉等的记载，在这方面当然具有资料价值。但假使研究者搜集的大量方志中，其中有一些记载不及井、泉，研究工作就会出现地区上的空白，造成困难。

最后，地方志的实用性，除了资料的丰富适当外，还有至关重要的方面，即让读者使用便利。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文献，数量成倍增加，面对浩瀚的资料，研究工作者的工作量也空前增加。陈正祥在前述论文中描述他利用方志的艰苦过程：“中国方志数量很多，每一州县有数册或数十册，在书库用梯子上爬下取书，按目逐页地找寻。”这是何等繁琐的工作。假使今后利用地方志都仍需通过如此复杂的过程，势必有人会放弃地方志而另求他书。因此，时至今日，地方志修纂中，索引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索引，研究者利用地方志就不再需要“按目逐页地找寻”。将会空前地提高志书的利用效率。我的一位学生陈田耕君曾编著《地理文献检索与利用》^①一书，他在此书中谈到索引时说：“文献之需要索引，犹如行舟之需要舵”；“检索工具没有索引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纸，甚至不成其为检索工具”。索引的价值于此可见。现在，由于电脑的应用，为地方志编制索引，在技术上也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所以修志同仁对此必须予以特殊的重视。《中国地方志》和《浙江方志》已经就索引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而我省出版的诸如龙游、慈溪、余杭诸志，也已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可喜的成绩，我就不再赘述了。

地方志与乡土教育^①

修纂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根据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我国地方志(包括残本)上起南北朝,下到民国,总计为 8371 种。这是我国的一宗重要文化财富。浙江省历来是修纂地方志的著名省份,现存或残存地方志共 602 种,仅次于四川(673 种),居全国各省区的第二位。

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志修纂曾一度趋于停顿,但从 80 年代初期起,百废俱举,地方志修纂也迅速得到复兴。仅十年工夫,全国各省区(除西藏外)即均已有了新修市、县志出版。根据《中国地方志》1991 年第 3 期中《各省市县志书出版情况》一文的统计,截止 1991 年 4 月,全国市、县新志总数已达 350 种。其中尤以黑龙江省为最,全省 39% 的市、县已修成新志。浙江省在这一时期亦已出版市、县志达 18 种,并另有数种正在印刷之中。

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地方的积极性,这一次修志高潮,从组织的完整严密,涉及范围和地区的广泛,投入人力物力的众多,志书质量的普遍提高等各方面来看,在我国地方志修纂历史上确无先例。各市、县都建立了地方志修纂委员会,选定了主编和编委,并组成了有各部门人员参与,人数可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庞大写作班子。为了搜集资料,修志人员的足迹几可遍及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有些市、县还千方百计从国外图书馆引回了流散在外的

当地旧志孤本的复制本。以我个人来说，近年来即先后应省内市、县委委托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引回乾隆钞本《越中杂识》，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引回康熙二十一年刊本《象山县志》，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引回康熙二十二年钞本《常山县志》，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引回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这些都是流散在海外的我省地方志孤本，因这次修志高潮的机会得以引回，确实令人高兴。

在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近 10 年辛勤工作以后，正在陆续出版的各地新修志书，一般都资料丰富，内容完备，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但现在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花了极大力量修纂的地方志，应该怎样发挥它们的作用？现在的确有一些地方，辛辛苦苦地修纂新方志，热热闹闹地举行新方志发行会，但此后，也就偃旗息鼓了，没有谁再去过问新修志书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对于地方志的作用，我国历来就有“存史、资治、教化”的说法。确实，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大批旧方志，它们在科学的学术研究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竺可桢先生写出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①，陈正祥先生研究明朝的蝗虫灾害，绘制成《明代北方蝗灾之频率图》^②，我编成《浙江灾异简志》^③，均利用了大量旧志。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旧方志的作用实在功不可没。但是，方志更为广泛的作用或许还在于“教化”。我国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其志向、抱负、品质的构成，常常须追溯到孩提时代所受到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则往往同方志所载内容有关。方志实在称得上是一种教材。旧方志在这方面已提供了许多范例，新方志当然

① 《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② 《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